

配偶、子女与留下的人

Dr Alexander Ressos, TEP
Attorney-at-Law (Switzerland), Solicitor (Hong Kong),
Solicitor (England & Wales)

裁决要求就家庭问题作出决定。已婚男子离开时须携妻子和未成年子女同行，除非其妻子拒绝随行，或当局为天主教信仰而要求留下子女。《奥格斯堡和约》中“携妻儿”移民的表述，反映了家庭随家长而行的普遍假定。在洛迦诺，这一问题存在争议。天主教一方力图留下子女以接受天主教教育。文献记载了家庭成员留下的案例、财产在移民与顺从的亲属之间分割的案例，以及后来的遗产纠纷。¹ Muralto 家族分为苏黎世和伯尔尼两支，而洛迦诺古老家族的其他分支则在洛迦诺保持天主教信仰。²

留下的人并未因此得到安宁。离境前数周教廷使节驻于洛迦诺、多明我会的布道运动，以及对与使节争辩的妇女的起诉，都表明当局力图使全城重新皈依，并防止此类事件重演。对于留下的家庭而言，顺从是保有财产、职位和行会成员资格的条件。因此，裁决的结构对那些财产不可移动、生计依赖本地的人构成了放弃信仰的强烈激励。同时，它又使那些财富可以流动、技能可以转移、人脉延伸至苏黎世的人得以离开。

1 教廷使节与妇女审判案

1555 年 1 月，教廷驻联邦使节 Ottaviano Della Rovere 来到洛迦诺，邀请多明我会修士布道，以使新教徒重新皈依。³ 在一次关于圣餐

配偶、子女与留下的人

变体的布道之后，Lucia Orelli 要求与使节进行神学讨论。Della Rovere 传唤她时，她与 Barbara Muralto、Caterina Appiani 及其他妇女一同前往，她们在神学论辩中重申了自己的信念。司法记录显示，Barbara Muralto、Lucia Bellò 和 Caterina Appiani 各被处以 50 克朗罚款，其财产被没收。经过近两年的交涉，在流亡团体的支持和 Heinrich Bullinger 的介入下，亵渎罪的指控因缺乏证人而撤销，处罚也被减轻：Barbara Muralto 被判缴付 30 克朗，Lucia Bellò 缴付 20 克朗。

此案显示了裁决作为法律解决方案的局限。关于移民的一般决定并未终结移民因离境前所为之事而面临刑事程序的风险。他们在洛迦诺的财产仍是罚款和没收的目标。追回这些财产需要苏黎世施加外交压力，以及团体代表在联邦议会持续不断的申诉。另一方面，罚款的减轻和亵渎罪指控的撤销表明，当归正宗各州坚持时，共同领地的程序能够纠正过度之举。结果是通过谈判减轻处罚，而这正是联邦共同治理体制往往会产生的结果。

常见误解。1555 年的洛迦诺流亡者有时被描述为失去一切、以赤贫之身抵达苏黎世的难民。史料所示恰恰相反。1554 年的裁决允许归正宗信徒携家眷离开并出售其财产，而 Martino Muralto 和 Aloisio Orelli 等主要流亡者在抵达后两三年内，便在苏黎世向丝绸、天鹅绒和纺织品贸易投入了大笔资金。损失是真实存在的，因为强制出售、罚款和没收减少了他们的财富，一些家庭也因此分离。然而，1555 年的流亡是有产家族依据公法进行的有序离境，正因如此，它才能成为第 B.II 章所追溯的经济史的起点。

2 注释

1. Meyer, Die evangelische Gemeinde in Locarno (见前引) ;
Simona Canevascini 与 Piero Bianconi, L'esilio dei protestanti

locarnesi (Locarno: Armando Dadò, 2005)。裁决中关于子女的规定。

2. Nicoli, “Muralto, Barbara” (见前引) (Muralt 家族的苏黎世和伯尔尼分支); Pauli Falconi, “Muralto, Martino” (见前引) (其子 Lodovico, 又名 Hans Ludwig, 为伯尔尼 von Muralt 家族的创始人)。
3. Nicoli, “Muralto, Barbara” (见前引) (“il nunzio papale e vescovo di Terracina Ottaviano Della Rovere (o Raverta)”)。较早的文献中也将其名写作 Raverta 或 Riverta。

仅供一般参考。本文不构成法律或税务意见，不能替代针对个案的专业意见，亦不建立律师与客户关系。本文反映截至 2026 年 9 月的法律状况。

在线版本: cn.helveticaregister.com/lugano-spouses-children-and-those-who-stayed